

核心话题 >

全球经贸格局变化或引发跨境直接投资深度调整

跨境直接投资是全球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本、技术、产业、商品乃至文化和规则在区域及国别间流动的载体,在刻画全球经济版图的同时,也深受经济格局演变的影响。进入2018年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出现一系列明显变化,主要体现在贸易关系、经济增长态势以及技术变革等方面,势必会改变跨境直接投资的流向和结构,进而重新塑造各类经济体的发展环境。

从经济基本面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分化,发达国家经济总体复苏,相比之下,土耳其、南非、阿根廷等部分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本币汇率大幅下跌,面临资本流出的巨大压力,经济发展不确定性较大。尽管新兴经济体经济下行压力部分是由发达经济体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以及加息等紧缩货币政策引起的,但主要还是来自于自身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缓慢以及资产价格过快增长等内部因素。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基本

文/王是业

作者单位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下行,不仅意味着投资回报率的衰减,也酝酿着潜在的运营和管理风险。经济基本面的持续改善、汇率及利率的提高,将拉升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收益水平以及投资者对发达经济体增长的预期,推动资本从新兴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回流,促使跨国企业加大对发达国家投资。

从贸易关系来看,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挑起并不断加剧国际贸易冲突,采取加征进口关税等手段限制外国商品进口,另一方面又以此为要挟,要求贸易伙伴接受所谓的“对等贸易”关系,做出与美方相同的关税减让和市场开放承诺。近期,美国试图与关系紧密的贸易伙伴达成更高标准的经贸协定,尽管存在分歧,但已与欧盟在贸易问题上达成了包括降低关税、消除补贴、扩大进口等初

步共识,在此基础上拉拢日本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在8月末初步与墨西哥基本达成新的贸易协定。此外,2018年7月,日本与欧盟签署了迄今为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不排除未来或将形成美、日、欧的自由贸易闭环。不论是贸易讹诈还是商签和升级高标准自贸协定,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都希望借此改变全球经贸规则和受益格局,打破原有双边贸易体系中“经济发展水平与出价水平匹配”的基本原则,使自身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发达国家加高对部分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壁垒并通过商签自贸协定等方式降低与紧密伙伴之间的贸易壁垒,实质是重新划定“朋友圈”亲疏等级,试图将部分新兴经济体排除在其主导的贸易、产业体系之外。

跨境直接投资主要服务于全球价值链体系,后者对前者发挥导向性作用,发达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大幅提高了跨国企业将新兴国家生产的产品出口到发达国

家的成本,迫使跨国企业对全球供应链做出调整,重新规划生产投资版图。

从科技发展格局来看,即便在金融危机时期,发达国家仍是全球技术创新和产业技术革命的中心。与此同时,美国、英国、德国等已经对外国投资安全审查相关法律进行了修改,大幅限制外国资本并购本国高新技术企业。如果发达国家持续将政治因素纳入外国投资安全审查,甚至与盟友合谋限制特定国家投资,那么在高科技产业中,发达国家盟友之间的相互跨境投资将明显增长,而新兴经济体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将大幅减少。部分新兴国家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科技研发领域并购投资大幅下降,绿地投资和非高科技行业投资保持相对稳定。

此外,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对跨境直接投资也将持续产生影响,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降低减少了企业在美生产成本,

提高投资收益率,也将一定程度上抵消新兴经济体的成本优势,刺激美国企业海外3.2万亿美元利润回流。

通过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吸引外资规模均位居世界前列,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跨境直接投资的主要参与者,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和资源整合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本轮全球经贸格局的变化也对我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可能进一步作用于我国双向跨境直接投资。

但首先应明确的是,相较于正面临危机的土耳其、阿根廷、巴西、南非、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我国在经济体量、产业基础、市场规模、科技水平、贸易竞争力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抵御和化解外部环境变化风险的能力更胜一筹,但也要未雨绸缪,深入全面分析贸易摩擦、发达国家缔结自贸协定等对我国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的影响,及时作出战略和政策调整。就对外投资而言,即便

部分发达国家明显收紧外资安全审查限制,我国还应推动企业对外投资稳定和高质量发展,扩大资源整合地域分布,在规则允许范围内并购优质资产,逐步构建全球性的产业链体系。此外,我国跨国投资企业还应对接国际标准,完善自身治理和管理水平,扎实推进本土化经营,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在东道国市场逐渐站稳脚跟,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以及我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纽带。

就吸引外资而言,近期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放宽外资企业准入的政策,效果已初步显现,下一步还应推广自贸试验区的营商便利化措施,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完善企业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打造覆盖广泛的社会信用体系,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在此基础上,还应充分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商品运输流转环节的费用水平,遏制房地产价格和房屋租金的过快上涨,切实降低企业各项成本,保持效率优势。

囊中江湖 >

数量管制还是平台竞争?

小县城里的人喜欢吃鱼,对鱼的需求很大,菜市场里卖鱼的摊位就有钱赚,让其他摊位羡慕,于是其他摊位的人纷纷转换业务,做起了卖鱼的生意。卖鱼的人多了,鱼的价格就会下降,原先的鱼摊就不干了,向市场管理部门提意见,认为现在卖鱼的摊位太多,导致了恶性竞争,鱼的品质下降,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市场管理部门采纳了这个意见,为了确保食用鱼的品质,决定对市场内的鱼摊采取许可制度,拿到许可证的才能卖鱼,没有许可证的不能卖鱼。于是原先的鱼摊一个不剩拿到了许可证,而新转型的人中只有少数人拿到了许可证,多数人没拿到,就只能干老本行。有了许可证的保障,卖鱼的商户又能吃香喝辣了。

当地的老百姓原先习惯于几个鱼摊买鱼,没觉得这鱼的价格有多贵。后来卖鱼的人多了,忽然发现鱼的价格其实可以很便宜。不仅如此,鱼的品种也丰富很多,挑选余地大,家庭感到生活变好了。虽然众多的鱼摊品质差异很大,买到劣质鱼的事

文/周业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情也是屡有发生,但总体上老百姓还是喜欢价廉物美的鱼。后来采取了许可证制度,一下子回到了以前的状况,很多老百姓就有点受不了,发点牢骚是难免的。但市场上卖鱼的就那几家,鱼还得吃啊,发牢骚也没啥用。后来有个人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这本地市场不是得需要许可证才能卖鱼吗?那就不在本地市场卖。这个摊主在网上注册了一个网店,专门卖鱼,这个网店的模式很简单,就是建立一个网络平台,让外地的养殖户或者鱼贩直接注册,缴纳一定的费用,然后家庭可以上网订购,平

台负责撮合双方交易,订单下好,商户就会派人把鱼送来。这就大大便利了家庭的买鱼活动,家庭可以足不出户就能买到鱼。

这家卖鱼平台慢慢开始在县城流行起来,很多家庭都通过平台买鱼,不再去市场,市场上旧鱼摊前就显得冷清了。这下商户又不乐意了,怎么办呢?得想个法子遏制这个发展势头。这时出现了一个机会。有户家庭从平台上买了一条鱼,是处理好的,可能是这条鱼没有处理干净,这户人家吃了拉肚子。于是小市场上的摊主决定去调查网上卖鱼的商户的底细,更是发现了一系列问题,由于平台没有及时审核注册商户的资质,一些商户根本不具养殖条件,就开始养鱼,这就导致了鱼的品质无法保证,会严重影响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有了这些料,那得好好爆料,于是小市场上的鱼摊就请人整理这些材料提交给监管部门,监管部门一看,这还得了?影响老百姓健康的事情坚决要杜绝。于是就责令商户整改。整改的项目之一就是必须本地人才能在平台注册,否则平台就不能在本地市

场开展业务。这样一来,当地的家庭即便上网订购,也只能买本地人提供的鱼,而本地卖鱼的就小市场那几家,这就和没有平台时没什么两样。家庭再一次回到了从前的日子。

在当地的小市场上,也不是所有的鱼摊都不思进取。其中有一家规模较大的鱼摊认识到互联网是个好东西,会带来新的商机,于是决定实行业务模式转型,从原先的小市场现场售卖模式转为网上售卖模式。于是这个摊主在小县城租了一个院子用作鱼的储存,然后招募一些人组建送货的团队,统一服装,骑同款的自行车,一出门标志显著,企业的形象算是树立起来了。然后该摊主又请人设计平台,建立了自己的平台,和先前那个平台不同,这个平台并不接受各种外地养殖户或者商户的直接注册,而是自己先选好各种鱼的采购基地,然后把采购基地的各种信息完全透明化,放在网上,供家庭自己查询。平台对采购基地采取认证,合格了才把采购基地挂出来。平台统一采取定价策略,不能让采购基地私自

定价。平台还不定期对采购基地进行抽检,保证鱼的品质。这个平台一经建立,就赢得了当地家庭的欢迎。无奈当地的监管部门为了安抚小市场其他商户,给这个平台进行了限额,由于规模上不来,新商业模式花费又多,导致上面卖的价格贵,一般都是县城里家境比较好的人才会在这个平台购买。

这个新的平台是有当地许可证的,所以当地小市场的摊主没法非议。但这些摊主可以在先前的平台接单,有好单就接,没好单就不接,反正还可以线下售卖。所以也过得不错。而原先的平台经过整改重新运营,为了在短期内获得竞争优势,迅速扩大规模,把送达服务在时间上变为全天候,在空间上达到县城的各个角落,甚至县城的周边乡镇。这样一来,原先的平台就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当地主要的鱼商。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原先的平台想到了一个规避管制的方式,就是招募当地的一些人从事鱼的网上交易。这些人从外地进鱼,放在网上销售,卖给当地的人。由于是本地人卖鱼给

本地人,并没有违反规定,所以平台得以快速扩张。而当地小市场的摊主吃了哑巴亏,还没法反驳。因为当时的规定没有明确网上卖鱼的本地人必须得有许可证。原先的平台上,就存在两股卖鱼的势力,一股是原先小市场的鱼摊,一股是新加盟的当地人。平台显得越发红火。

本地人卖鱼未必比外地人卖鱼诚实。人性都类似,都有自利的一面。以前出现的情况现在还是会出现的。一些本地人为了多图点利益,就会以很低的价格去采购不合规的养殖户的鱼,从而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健康隐患。对当地的监管部门来说,这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如果把平台关了,当地家庭买鱼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不关,又难以杜绝商户卖劣质鱼。只好再次令平台整改。小县城的鱼市真真的无解吗?其实不是。假如不给新平台数量管制,而是让新平台去和旧平台竞争,同时监管部门重点监管食品风险,而不是商户数量,那么实际上这些问题都很容易解决。那为何非得把数量管制当作最核心的机制呢?

自由谈 >

潮流之内

这些年来,我对康有为的认知,是一个“正-反-合”的过程。所谓正,源于小时读正史和历史文化教科书,康有为被塑造为正面人物,他的维新思想被形容为“思想界之大飓风”“火山大喷火”,他发起的改良运动被判定为“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具有进步意义”,当然他也有局限,即阶级局限,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最大原因。如此等等,俱是宏大叙事。当时真正打动我的应是他的一句豪言壮语。荣禄问他,祖宗之法如何遽变,他悍然答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句话出自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未必可信。随后还有一句话,与之遥相呼应,说来好笑,这竟不是谭嗣同的名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而是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杀荣禄,清君侧,袁世凯表态道:“……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此言出自梁启超《谭嗣同传》,可信度同样不高。然而,彼时我非但无从辨识这两句话的真伪,反而为之震撼不已。那两个“杀”字,构成了我对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最初印象:康有为不

文/羽戈



作者为法律学者

是书生,而是豪杰,戊戌变法则是杀气纵横、杀机四伏的政治运动。

二十岁后,开始读史料。我发现了非常奇异的一幕:近世人物笔下,除了康门子弟,罕见对康有为的正面评价。像汪康年、张元济那样,一面批评康有为行事操之过急,不能容纳异己,一面肯定其开风气之功,已经相当难得。更多人只有贬斥,毫无赞词,譬如与康有为原本交情匪浅的沈曾植,其人亦属新派人,戊戌年后,谈及康有为,简直深恶痛绝:“糠粃大名,遂满宇宙;南城谈士,卷舌无声。假留我辈数人,何至令渠跳梁如此?……世事非变法不可为,而变法之机,为此君凶莽灭裂,中生变阻。”(沈曾植致文廷式)“康逆平生伎俩,专著名流文字,上欺贤宦,下罔生徒,如朱蓉

生(朱一新)、文仲躬(文梯),皆其徒所称康逆讲学至交者。文幸身为台官,得以上书自白;蓉生身后著述大行,彼党不得以一手掩天下人耳目。……天祸人国,生此妖物。”(沈曾植致王彦威)“康梁之说,邪说也;其行事,则逆党也。事状昭然,无可掩饰。彼且饰其邪逆,颯然自称曰新党。其狡谗之计,不过欲以此名强自解于天下,而又冀污染海内士流,误朝廷而断丧国家之元气。”(沈曾植致黄绍箕)……若不知情,还以为沈曾植与康有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实则二人并无一分私怨,沈氏的批评,完全出于公论。

我读中国近代史,大爱高阳先生的小说。譬如慈禧全传等,虽是小说家言,知人论世却鞭辟入里,洞幽烛微,有时完全可作信史来读。无独有偶,高阳对康有为也是十分不屑。不必说演义的小说情节,单是《十疑康有为知世如知世》,“奔走皇室权贵门,每言常最热情敦”“不幸有兄如此人,无端诛戮忽临身”“使得人间造孽孽,师徒海外望如仙”云云,字字如刀,把康有为切割得体无完肤。更有甚者,高阳曾在《翁同龢传》序中立誓:“……尤其是康有为卖君、卖师、卖弟、卖友之罪,有我高

阳在,他将无所逃于天壤之间”,他声称要写一本《戊戌变法新考》,来戳穿康有为的画皮,可惜未竟全功。我还见过他人引用高阳的一句话:“近世高级知识分子,欺世盗名,奸险无耻,莫过于康有为”,只是不知出处何在,姑且抄在这里。

除了其人的品行,此时我对康有为的反感,还关乎政治路线之争。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属于标准的激进派,我则坚持渐进本位,讲究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等,对于激进主义的种种路数,如大刀阔斧,一蹴而就,自然看不入眼,啧有烦言。至于以康有为作靶子,拿他开刀,则是因为,一来他是一个失败的激进派,戊戌变法是一场失败的激进运动,二来激进主义的缺陷,在他身上皆有鲜明表现,因此最适合拿来批驳。

等我真正学会知人论世或知世论人,已经是三十岁后。人与世是一体两面,互相成就或败坏,论人必须知世,论世亦当知人。拿康有为来说。他的激进,固然有学问和性格成因,却也与世道或时代的剧变息息相关。如梁启超所云:“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甲午一战,人心思变,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严重刺激之下,倾向激进,正在情理之中;从另一面讲,康有为的激进策略所主导的戊戌变法,加剧了时代的前行速度,甚至直接点燃了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火种,这则是人对时代的造就。明确了这两面,我对康有为,再无爱憎分明的成见,而努力尝试胡适所言的“持平之论”:“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胡适致苏雪林)这似乎可视作正反之后的“合”。

以往研究戊戌变法,大多以事为脉络,我则别出心裁,试图以人为线索,把人置于时代的激流漩涡之中,观察人的抉择如何影响时代,抑或时代影响人。不难发现,康有为的激进塑造了戊戌变法的政治气质,戊戌变法所开启的激进时代一路狂奔,反把始作俑者远远抛在身后。戊戌年前,他是时代绿茵场上的前锋,戊戌年后,则渐渐退回中场、后卫,以至在替补席上落落寡合,蹉跎日月——这不是康有为一个人的命运,严复,以及以善变著称的梁启超,何尝不是如此呢(民国初年,梁启超尚且能够追随潮流,与时俱进,等到五四运动,革命浪潮

风起云涌,他则无奈落伍于时代,1929年初去世之时,舆论反应之冷淡,并不足以匹配其历史地位,杨度挽联遂有“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之叹)。由此可见人与时代的纠结。我们称康有为为造势者,然而他所造之势,反把他淘汰,他所启动的时代,反把他抛弃。

既然已经说到康梁,不妨提一笔谭嗣同。近世人物,谭嗣同是我最喜欢甚至崇拜的人之一。基于这样的深情,以前写他,不由圣化,譬如他在戊戌年的转向,他的死亡等等,我的论析,常常以建构、巩固他的英雄和侠客形象为目的,其代价,则是失真。真则是历史学第一价值。如此一来,必须选择,我们到底需要一个真实的谭嗣同呢,还是虚化的谭嗣同——如承认他感恩于光绪的召唤而北上,从革命转向改革——可能有损他的光芒,却使他的生命愈发鲜活,使他与时代的距离愈发亲近;原来像谭嗣同这样的人也曾受困于肉身的苦痛,也曾局限于时代的束缚,他是时代中的人,而非时代外的人,他为旧时代(改革)赴死,而为新时代(革命)永生。